

公益性与收益性的系统耦合: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卓越发展的实践回顾与现实审思

张欣亮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摘要: 公益性与收益性是公立大学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的一对关键性议题, 二者的系统耦合是大学实现卓越发展的重要基础。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 通过对择优发展的重点事项实施资源配置优化, 推动学校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多元筹资、提升科研与教学等方面自觉发展。该校以教育公益性为核心, 不断拓展大学收益的覆盖面和转化率, 构建出系统发展与高校自觉的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

关键词: 奥克兰大学; 系统耦合; 内涵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22)11-0064-09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2.11.003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被誉为新西兰“国宝级”大学, 自1883年建校以来, 该校一直秉承智能探究、协同创新和公平多元的价值理念, 坚持在教育公益性和收益性的耦合中谋求自身卓越发展。在最新公布的2019/2020 QS世界大学排名中, 奥克兰大学位列第83位, 是新西兰唯一跻身全球前100位的大学。在专业方面, 奥克兰大学在40个专业领域中有37个专业全新西兰排名第一, 有13个专业在世界排名前50位^[1]。作为新西兰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国际教学中心和学术研究中心, 它是唯一一所能以大学个体代表国家整体高等教育发展水准的生动典范, 尤其是该校在公益性与收益性的交互促进中进行战略布局与系统推进, 实现贡献社会、高校自觉和普惠大众协同共赢、多维并进, 为各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良好借鉴。

一、大学公益与收益的耦合联动

(一) 系统耦合的学理阐释

耦合(coupling)起源于物理学, 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乃至联合共生, 或者通过各种内在的机制互为作用, 形成一体化现象。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被称为耦合关系^[2]。当两个以上独立的同等级的子系统交互部分发生耦合, 形成一个新的整体系统时, 就构成了系统耦合(system coupling)。系统耦合可能使原来的系统发生进化, 变为一个新的系统, 即复合系统^[3]。根据总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结点模块特征, 耦

合关联一般可以分为紧密耦合、非耦合和松散耦合等三种类型^[4]。耦合理论为我们解构大学变革与发展的系统模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随着现代大学多元职能的快速演变, 大学内部及其与区域之间的依存关系日益复杂, 彼此在相互调适中形成独具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5]。对于自觉发展的大学系统, 系统耦合为大学内部各子系统的有机链接提供了动力机制与组织保障, 导引着现代大学在社会经济承载力范围内不断转型升级, 为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一体化构筑智能联动体系。

(二) 大学公益与收益的交互促进

1. 公共性: 大学公益之基

在市场化 and 现代化的浪潮中, 大学的组织边界、思想边界、价值边界趋于模糊, 但是在公共目标上, 大学应为人们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学业成功做好准备; 同时, 大学应以一种值得信赖及开诚布公的方式从事研究和对待学问, 将积聚的各种知识与技能的益处运用于公共利益之中^[6]。大学在创立之初就是作为向人类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的共享场所, 它的公共性是大学公共场域内政府、大学、社会、市场、知识分子及其他个体围绕着价值、知识、资源、权力等要素所共同型构的具有普遍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社会关系^[7]。正如普瑟指出, 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在于其充当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角色。他援引哈贝马斯的定义提出, “公共领域”摆脱了政府和私人利益的控制, 各种有关政府和私人利益的观点可以在此自由辩论和表达, 在这里发生着公共对话、思考、创新, 在此过程中社会共识逐渐达成^[8]。因此, 作为“公

收稿日期: 2021-09-23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授课型硕士学位制度国际比较及应用研究”(编号: C2021127)。

作者简介: 张欣亮,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 国际交流处副研究员, 教育学博士, 研究方向: 比较教育。

共领域”的构成实体,现代大学应维护教育的“共同利益”,其教育结果应是人类社会公共收益的现实体现,它的教育产出是人们共同享有的公益供给。

2. 效益性: 大学收益之要

作为一个学术自治组织,大学如果希望获取更多的自治权力,就必须增加吸纳市场资源的能力。它只有更为多元地获取各类生存性要素,并将其转化为支持学校卓越发展的收益性资源,才能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来行使符合自身预期的改革设计与办学实践^[9]。在政府对公立大学预算拨款的相对和绝对下降的影响下,公立大学对于成本收益和成本控制关注已成为影响校内非学术领域和学术领域的重要导向。例如,政府公共财政的衰退以及企业外包本身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使得不少公立大学开始在大学校园大肆推行商业外包。随着外包迹象的逐步延伸,其范围从非教育的服务领域(如餐饮、书店等)逐步蔓延至教学、图书馆的学术核心领域^[10]。其有利方面是便于公立大学从非学术领域的外包中缓解公共经费困境,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为自身拓展赢得广阔的生存空间;其潜在挑战是由营利思维来主导大学非学术乃至学术领域的运作进程,其后果是造成学校的身份标识很可能由局外人予以定义^[11],对公立大学的公共形象和学术长远发展产生影响。

3. 公益性与收益性的耦合: 大学发展之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 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的报告中指出,“国际上常常将教育作为一项人权和一项公共利益事业”^[12]。而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现代大学不仅以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职能承担着“公共事务”,而且是满足、思考、批判、引领国家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公共领域”。因此,高等教育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大学要想获取一定时期内长久稳定的发展空间,来自大学之外利益共同体的资本收益就是其无法回避或抗拒的发展要素。只有将更多的生存要素转化为支持学校恒定发展的收益性资源,大学的发展才能在社会经济承载力的范围内定向发力和有序蜕变。

由此,公益性与收益性,这对原本看似矛盾的独立系统构成了支撑大学平稳发展的动力体系,而二者之间的系统耦合则成为大学均衡发展的动力支点。大学的公益性是其普惠光芒的外在表现,而收益性是它内含聚力的要素来源,当两个子系统在遵循高等教育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时,它们就为大学创造出一种既有自发性又具人为性的系统形象。

二、奥克兰大学卓越发展的实践回顾

作为新西兰举全国之力发展的公立大学,奥克兰大学早已深刻地嵌入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公共需求和市场力量、社会责任和学术自由、集体价值和个人诉求都可以在该

校大学组织中找到相应的缩影。因此,价值诉求的公正性、资源配置的公平性、知识生产的公益性构成了考察学校公共性的基本维度^[13]。对于奥克兰大学而言,该校始终将人文关怀作为学校的至关重要的内核属性。作为一所全球城市大学,它致力于为急剧变革时代所带来的未知挑战提供根本方案,在知识生产、分享和塑造方面追求卓越。它在彰显学校公益表现的同时,将学校的文化和财政收益作为支撑学校公益性的重要支架,使学校在信息时代行稳致远。

(一) 立足公益: 奥克兰大学价值塑造的校脉沿革

1. 校史传承

1883年5月23日,奥克兰学院正式升格成为奥克兰大学。从建校初期的95名学生和4位教员,发展成为拥有超过4万名在籍学生,年均毕业生人数近1万名的世界名校,奥克兰大学在其1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5个重要历史时期,分别是建校初始期(1883-1929年)、科研上升期(1930-1940年)、战后扩张期(1950-1970年)、纵深拓展期(1989-1990年)、新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14]。

奥克兰大学建立之初是以学院为建制的教学机构,是为社会培养教育和法律人才,为社会的公益事业提供人才支撑。在1962年独立建校之前,该校在79年间先后完成了由单一教学为重转向文科教研并举的转型,为学校独立建校后的科研兴校奠定良好的学科氛围与研究基础。独立后的大学,在师生福利、生源配比、学术激励、性别公平、基建投入等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力,令学校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教育公平的各个方面。这些举措为学校迈入21世纪的卓越发展积累了充分的学术资本和校内共识,使得公平、创新、普惠始终成为推动学校向善发展的不竭动力。

2. 价值内核

奥克兰大学始终将平等、多元、协作视为大学的核心价值所在,并将这些特质融入大学精神中。该校将它们具象为“尊重与正直”(Respect and Integrity)、“卓越”(Excellence)和“服务”(Service)等三个方面,将其内化于大学战略规划中,以便校内外利益相关者共同传承与传播这些核心价值观^[15]。具体而言:

“尊重与正直”表明,大学应尊重与欣赏每个人所具有的特质,利用各自所独具的力量;始终以公正、开放和诚实的态度行事。“卓越”表明,作为世界知名学府,大学将竭力为公平和可持续社会作出贡献。“服务”表明,积极服务与公民责任的道德规范是社会参与的基石;与真正的伙伴共促繁荣、共同实现愿景;运用各类知识、技能与专业促进社会变革。

奥克兰大学价值观的三个方面从不同的视角来观照大学作为“公共领域”在维护教育“共同利益”方面的现实作用,使得大学精神成为指引大学为人类社会不断创造福祉的价值基础。在大学价值的引领下,奥克兰大学以人为本,将人类的本源发展需求、奋斗历程和创建更好的世界作为大学

实体建设的重要目标,通过大学所提供的各类教育服务将个人同社区和世界进行联通,真正体现出人与世界共同成长的良好性格。

当前的大学迫于内外的效率、效益压力,往往陷入“非理性繁荣”的价值困局,甚至走向过分追求以营利为目标的收益导向。例如,在外部层面上,大学迫于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和市场有偿投入而接受它们对大学进行制度规训;在内部层面上,大学的核心活动已经迅速地、旨在使每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16]。作为一所培养社会公益人才起步的大学分院(constituent college),奥克兰大学并没有将资源、级别和排名等功利和短时效因素植入学术和人才评价机制设计,而是从对人类真正权利的终极关怀出发,将对公正、平等、惠众的自觉追求以及对于和谐世界、公共责任的自觉维护纳入办学愿景,使得“尊重与正直”“卓越”“服务”的价值理念体现于大学对人的关怀、公共职业的操守乃至整个人类家园的重塑。如果将大学的价值观视为大学精神的道德表象,那么大学愿景就是在大学精神指引下建设成果的预期收益。奥克兰大学所构筑的建设愿景使其能始终围绕引领国家和社会“公共需要”来构建大学收益体系,使得大学免于陷入“非理性繁荣”的价值困局。

(二) 催生收益: 奥克兰大学资源配置的施为方向

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是大学抵御潜在内外部压力、产生各类预期收益的重要方式。它的基本目标应是给予受教者公平的机会和更多的选择权。公共资源供给和配置既不应背离“应得”原则,也不能损害“相称”关系,使得有限公共资源特别是优质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平等、均衡、合理安排与有效利用^[17]。奥克兰大学将资源配置优化作为学校战略发展的驱动因素,从大学教育服务产品属性的差异、大学基础性和关键性活动的特征、处境不利的人群,到少数族裔团结和国家战略意义地区的发展作为制度架构的有机构成,确保资源配置能有效促进学校多维收益的实现。

1. 资源配置的政策重点

自2002年开始,奥克兰大学就定期研制学校战略发展规划,并依据规划内容来配置学校各类内外部资源,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行动保障以及审视学校规划、行动和问责的内部政策,进而实现学校更高的绩效表现和国际排名。截至目前,奥克兰大学先后出台了4版战略规划,分别是2002-2004、2005-2012、2013-2020和2021-2030。自首份战略规划(2002-2004)颁布开始,奥克兰大学就开始探索择优发展的分类发展策略。根据学校内外部环境,它集中资源优先发展学校应对内外部挑战所需拓展的教学与研究素质^[18]。2021年,在最新版的战略规划(2021-2030)中,奥克兰大学从全球顶尖大学的战略高度,将“引领可持续生态的转变;改

善大众健康福祉;提升公正、文明、包容的社会;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分布式、安全的知识体系”等4个议题列为学校未来10年的优先发展事项,借此在学校资源配置方面有的放矢地予以重点关注和战略调配,以便大学在教育与研究方面的各种成就使社会充分受惠,保持学校在国际上的竞争力^[19]。

与此同时,奥克兰大学在4个优先事项中,将“教育与學生体验、研究与创新、合作与协同、赋能环境、人与文化”作为学校的战略落脚点,给予学校资源配置明确的行动指向,串联起其大学内外收益架构的动态体系,促使大学公共财政在“项目优先排序管理”的价值与实践层面能以公共产品理论为依据,为各类学生确保公平的教育机会,为学习资助体系提供资金,为支持高等教育中基础性知识和原创性知识的创造活动提供支持。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学生入学、教师发展还是环境改造、人文提升等方面,奥克兰大学都力求通过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来实现社会公众的现实利益需求,不断拓展大学的公共收益的覆盖范围。

2. 资源配置的保障体系

世界一流大学的持久收益既涵盖市场经济收益也包括社会文化收益,它的生产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程度的外部激励和监督体制。奥克兰大学通过大学内部评审、科研绩效评估、教学质量审核来保障资源配置高效运作,有效提高学校整体效能。

(1) 奥克兰大学以战略规划为依据,对大学内部的管理事务和治理水平进行年度绩效审核。为了更好地缓解资源困局,强化大学对于各类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分配,奥克兰大学自2004年开始启动定期大学管理审核,使大学财政分配不仅向高等教育委员会(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简称TEC)报告,还支持相关利益者依据大学战略规划将规划优先事项纳入其投资计划,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奥克兰大学将战略规划(2013-2020)作为衡量学校在2013-2020年间资源配置的审核纲要与实施依据,下设具体的绩效指标,实时呈现、监测资源配置的动态成效。以目标5为例,奥克兰大学以国内和国际学生作为2个具体的绩效指标,在每个绩效指标中均以近3年的同比数据作为审核基础,以便大学内部人员及时掌握学校战略目标的达成力度和变化趋势,为调整资源配比确立客观佐证。

奥克兰大学通过这种形式的审核不断提高大学管理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首轮管理审核是针对2005-2007年间,主要是对学校管理的六大板块进行考察,分别是战略规划和发展、资源分配、规划落实、职责定位、国际与国内合作、风险与质量管理^[20]。每轮审核过后,大学校务委员会都会总结大学里突出的管理实践和行之有效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形成一套良好的管理实践总则,为下一阶段的战略制定产生积极影响和正面推动作用。在最新公布的2019年度审核报告中,每一个战略目标所对应的绩效指标更为细

表 1 奥克兰大学 2019 年度部分绩效指标达成表

战略主旨	战略目标	绩效指标(百分比)			
		2017 实际达成	2018 实际达成	2019 计划指标	2019 实际达成
成为人才汇聚之地 , 支持各类高成就、学 术与专业人员	1. 营造适宜的工作环境 ,实现期望、发掘潜能、 包容并蓄、高成就和高回报	生师比: 18. 2 专职教师比: 1. 5	生师比: 18. 1 专职教师比: 1. 4	生师比: 18. 2 专职教师比: 1. 5	生师比: 18. 3 专职教师比: 1. 5
	2. 营造卓越的员工体验 ,支持成功与融入	赞成比: 80	赞成比: 80	赞成比: 超 80	赞成比: 77
	3. 营造支持与推崇分布式领导的环境	赞成比: 62	赞成比: 62	赞成比: 超 65	赞成比: 59
吸引具有学术潜力 的学术 ,基于他们良 好的大学体验 ,帮助 他们成长为成功、富 有影响的毕业生和 忠实的校友	4. 具有较高学术潜力的多元学生群体	高分生占比: 57. 7	高分生占比: 60. 9	高分生占比: 60	高分生占比: 60. 2
	5. 学生总数年保持 1% 的年增长率 ,其中 ,国际 学生、授课型和学术型研究生占比维持增长	国内生: 82. 8 国际生 17. 2	国内生: 81. 6 国际生 18. 4	国内生: 82 国际生: 18	国内生: 79. 5 国际生 20. 5
	6. 每年授课型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 究生毕业率保持稳定增幅	授课型: 960 人	授课型: 1243 人	授课型: 883 人	授课型: 1201 人
	7. 营造优质的学习环境 ,最大限度地为所有学 生提供成功的机会 ,并给他们包容、智慧、富有 挑战性和变革性的教育体验	完课率: 88. 7	完课率: 88. 4	完课率: 89	完课率: 88. 6
	8. 独特、优质的课外体验 ,为校友提供最大价 值的大学体验	满意率: 95	满意率: 94. 8	满意率: 超 95	满意率: 91. 9
通过开展和应用优 质科研造福社会	9. 在所有学科提高科研产出	同行评定科 研产出数: 7348	同行评定科 研产出数: 7986	同行评定科 研产出数: 8000	同行评定科 研产出数: 6845
	10. 传播对新西兰和世界有最大影响和价值的 优质科研成果				
通过认同《怀唐依条 约》,造福毛利社会 与大学	11. 大学与毛利社会协同合作 ,成就共同愿景 与大学				
与国内外重要组织 和社区建立伙伴关 系	12. 加强对双边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组织合作 关系				
坚守核心价值观 ,成 为自主、可持续和公 正的组织	13. 维持增长型、多样化的收入基础 ,支持大学 行动	总收入(百万 新西兰元): 1147	总收入(百万 新西兰元): 1202	总收入(百万 新西兰元): 1214	总收入(百万 新西兰元): 1231
	14. 从捐赠收入和慈善收入中支取 1. 5% 的运 营收支 ,支持大学未来发展				
	15. 为教学、学习、科研和社区参与提供最优质 的基础设施				
	16. 高效配置各类资源 ,强化环境绩效	能源消耗(千 瓦时/平方米 建筑面积): 153	能源消耗(千 瓦时/平方米 建筑面积): 162. 8	能源消耗(千 瓦时/平方米 建筑面积): 159	能源消耗(千 瓦时/平方米 建筑面积): 154. 5
	17. 安全、健康的环境	意外伤害事 件: 554	意外伤害事 件: 515	意外伤害事 件: 低于 650	意外伤害事 件: 492
	18. 构建与大学使命、愿景相一致的治理、管理 体系	营业盈余占 收入比: 3. 3	营业盈余占 收入比: 4. 9	营业盈余占 收入比: 3. 3	营业盈余占 收入比: 3. 8
成为一所服务新西 兰 ,并在亚太地区独 具特色的全球顶尖 公立大学	19. 在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顶尖大学为标杆 的排名体系中确立国际领先地位	泰晤士排名: 192	泰晤士排名: 201 - 250	泰晤士排名: 前 200	泰晤士排名: 179

资料来源: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nnual Report 2019 [EB/OL]. (2020 - 02 - 11) [2020 - 12 - 25]. <https://www.auckland.ac.nz/content/dam/ua/auckland/about-us/the-university/official-publications/annual-report/annual-report-2019-web.pdf>.

致 ,具体数值更为精准 ,让校内的各个有形组织与机构都能在学校的战略规划的整体框架下锁定自身的发展轨迹与发力方向 ,在一定的逻辑指引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全校的发展潜能。

(2) 奥克兰大学以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组织体系 ,推进学校资源配置决策合理规范、执行有效到位。根据教育法案 1989 奥克兰大学给予管理机构充分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该法案将校务委员会、校长和各级管理者共同纳入大学

治理框架中。其中,作为具有最高治理权限校务委员会,成员由教师、学生、校友、少数族裔、校级领导等相关人士组成。多元化的委员构成使得大学能在有限的资源分配方面呈现出最大可能的观点碰撞,在集思广益的过程中迸发出最有利于学校现阶段发展的实效思路。尤其是委员中包括一线教师、在校学生、毕业校友等三类成员,他们能更多地从中介人的角度来审视与剖析大学阶段性挑战并提出个性化见解。这有助于打破学校内部相对封闭的管理模式和传统积习,激励学校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让一个“被剖析”的评价过程成为所有参与者积极思考和贡献智慧的过程,进而逐步实现大学内部优质资源均衡流动的态势,从整体上促进各类收益的实现效力。

(3) 校务委员会由外界理事主持,基于校本政策,对全校重大人事决定、长期发展战略、投资规划、绩效执行等事宜进行民主决策。就校本政策而言,大学章程(the Charter)、战略规划(The Strategic Plan)、资本计划和财务预测(Capital Plan and Financial Projections)是指导校务委员会审核各院校的学术发展建议、资源策略(人力资源、运营方式、产业和财务策略)以及评定有关建议的学术价值、相应资助方式的政策依据。

在具体操作上,校务委会下设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Audit and Risk Committee)、资本支出委员会(Capital Expenditure Committee)、公权领导委员会(Equity Leadership Committee)和金融委员会(Finance Committee)分别肩负各自的问责与监督使命,根据校本政策规定,这些校内机构所形成的多重组织体系确保政府拨款和各项收益能得到合理使用,监督各院部在学术以及财政方面的表现,确保大学在政府拨款维持稳定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国际学生和外部科研等非拨款性收入占比,确保大学收益能用于校内运作的核心领域,同时为大学预测与规划未来收益铺平道路。

(三) 普益公众: 奥克兰大学系统耦合的效能彰显

作为社会民生的重要内容,教育可被视作马克思·韦伯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在其中发挥导向作用的教育政策可理解为被赋予一定意义的“指令”。其中,人被其视为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元和出发点,是社会学思维体系内价值维度的最终指向。与此相关联的是, Schultz 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起源^[21]。此后, Luca 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又推动了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进一步研究。他认为,教育既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又可以促进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22]。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教育的本质是指向人的发展,彰显了个体的人对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经济与人的发展之间共同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诉求共生体。因此,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构成关联大学教育能级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重要联结节点,它们的效能显化成为大学

公益与收益耦合效应的实然表征,如图1所示。具体观照到奥克兰大学,该校将资金主要用于研究性教学、学生学习和奖学金,研究与创新工作的基础与商业运用,对区域、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贡献^[23]。借此,学校不断在公共层面提升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辐射力与增值性,使得学校的教育输出可以在适度导向中转化为反哺学校长远发展战略收益,在普惠公众的格局中为学校卓越发展争取更大的拓展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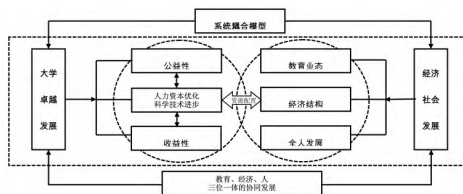


图1 奥克兰大学公益性与收益性的系统耦合模型

1. 将育人惠生与教育业态有机联动

就公立大学而言,关注和实现人的终身成长既是大学的职责,也是大学耦合公益与收益两大体系、形成人权价值的教育体现。进入21世纪,奥克兰大学就开始持续关注学生成就构成(Student Achievement Component,简称SAC),将其视作学校发展水准的重要指向和从政府获取财政投入的基础。如表4所示,该校在2016-2018的学校财政支出中,连续3年50%的财政收入用于人力成本(People Cost),将培养社会劳动力、优质师资及世界公民作为创新教育方式的核心取向。尤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实体教育造成重大冲击的背景下,学校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制定针对性和情景化的分类路径,保护大学各族裔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并提供具有保护性的学习环境,切实改善紧急情况与脆弱环境中的大学教育,在危机中谋求新机,在公益中孕育收益。

(1) 奥克兰大学有效利用大数据改善教育资源分配。智慧教育是教育发展信息社会的产物,是对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品的综合运用,它融合了育人智慧与技术智慧,契合了教育国际参与的本质需求。目前,智慧教育已成为各国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顺应互联网+时代全球教育转型的必然选择^[24]。奥克兰大学完备的数据收集与共享机制能令大学即时获取各类学生关键信息,追踪学生发展状况等情况,使得内部质量管理机制,即“教育输入—教育过程—教育输出”全过程的质量保障机制更为行之有效,具体包括学生入学质量控制、教学过程质量控制和学生学习结果的质量控制等三个方面^[25]。同时,学校利用即时、开放、共享、在线的数据链识别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和社会发展趋势,完善培养模式,不断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促进终身学习与技能发展,使得学校教育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于人的发展。

(2) 奥克兰大学不断强化以生为本的学习系统建构。该校认为,良好的大学教育系统应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变革,

倡导建构以学习中心的教育系统,强化大学教育的全要素升级,以应对各类外部因素对学习造成的学习危机。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系统,需要考虑学习环境、教学法和学习成功等三个组成部分^[26]。为此,奥克兰大学将质量、公平和全纳等多维概念融入校园建设中,保护包括毛利等少数族裔学生在内的优质教育供给,并让政府、社区和家庭都参与其中,共同构成学习友好系统,使得政府和社会能在互动网际中学校提供建设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学校成为具有优质师资、教学资源 and 适当范围的学习场域,而教学环境与教学系统的资金投入使得学习结果更有保障。

(3) 奥克兰大学始终保持与各类学生的纽带关联。它依托强大的校友资源网络,与未来学生、现有学生、毕业校友保持着密切关系。学校始终重视对于各类校友资源的珍视与呵护,将与各类学生、校友的合作视为大学与学生一同跨越生命发展阶段的价值属性。它定期邀请业界校友回校参与职业发展讲座、校园招聘、学生职业周等在校生职业发展项目以及部分课程教学活动,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各阶层的学生、校友等提供符合个人职业需求和生活期待的纽带关联。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不仅可以促进、维持他们对各自人生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还能增加他们对所处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而学生稳定的情感产出也会反哺其所在的学校,促使它形成广泛积极的社会意义,使之成为一定时期内为社会群体成员所接受的客观存在^[27]。大学在学生终身发展上的投入,有效实现双方在项目、政策等方面的有机联通,令各类社会资源可以持续反哺学校的公益行动。

2. 将科研定位与社会发展精密结合

作为一所世界顶尖的科研型大学,奥克兰大学深知只有将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转化为对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的影响,才能产生系统合力,共同助推大学卓越发展。相较于传统意义上仅以研究发明、科研刊物、创新成果、专利授权等显性产出作为衡量社会对于大学科研的投入回报,奥克兰大学更趋向于从科研对社会的影响力来重塑大学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与效率,在获取社会多重认可的基础上谋求更大收益。2017年,奥克兰大学各学科收益达2.52亿新西兰元,发表10903份科研论著,在新知识产权方面申请28项专利,衍生出8家企业^[28]。这些成功实践不仅令该校满足了新西兰对现代社会多元发展的庞大需求,获取了实质的经济回报,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建立起无形的区域网络和领导地位,从而在区域上产生对社会、人文环境及经济的长远影响力。

在改进社会方面,奥克兰大学专注于大学研究对于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影响。例如,为了增强父母育儿信息,缓解家庭冲突,改善儿童行为,学校成立育儿研究小组,聚焦积极育儿项目中的文化适切性,研究结果因适用于改善毛利家庭的社会关系而受到政府推广。在经济效应上,它通过创造新型企业和支持现有产业,为本国经济发展献计出力。例如,

大学派出知名学者入驻当地生物工程机构,研发多款智能产品,提升国内新型产业经济,为当地青年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在环境生态上,奥克兰大学通过与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协同合作,积极支持国家生态战略。2016年,新西兰宣布到2050年国家禁止捕杀行为。奥克兰大学生物系师生通过研究发现海洋生物生活轨迹和周边船只速度之间的关联,进而协助相关机构起草公约,为船只在近海航行设定安全阈值,切实保护海洋生物安全。这令大学在支持、落实国家层面行动倡议的过程中,将校内所聚集的知识和技能的益处运用于国家公共利益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实现科研创新的社会应用,以社会发展锚定学科起点。

三、奥克兰大学卓越发展的现实审视

公立大学是以普惠大众和贡献社会为前提,能自主地以专业教育行动为人类社会发展实现价值引领和要素输出的教育机构^[29]。有学者提出,教育本身也应该被视为一项全球公共产品,甚至被视为一项全球共同利益^[30]。这意味着公立大学必须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持续的合作与对话,同时借助各种途径向人类社会输送符合公共利益的教育产品,构建起强健的公共领域,不让任何人因为经济收入而丧失接受教育的权益。在这一过程中,公益性为大学的卓越发展寻径导航,使其始终恪守正确的办学方向;收益性为大学的突破创新注入不竭动力,使其能拥有足够的社会关注与多方投入,在自觉发展中实现大众利益。

(一) 公共产品: 大学公益性与收益性耦合的现实追求

公共产品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已经在人类社会具有200多年的学术史。从文献记载与学术承继的视角考察,公共产品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欧洲^[31]。它是当时欧洲封建领主向公众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产品^[32]。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Erik Lindal)在《公平赋税原理》中系统阐述公共产品理论。他提出,公共产品生产供给需要成本,它的生产同私人物品的生产一样,都是社会成员通过交易各自获益的结果。人们通过公共产品的消费得到满足,人们缴纳的税款则是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支付的成本价格^[33]。在此基础上,奥尔森和考尔等学者将排他性(Exclusive,受益群体是否有限制)、竞争性(Rival,获取产品是否接近零成本)与收益的溢出效应(Benefit Distribution)等作为确定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34]。

以奥克兰大学为例,该校自建校之初,通过男女同招、服务社会、鼓励公益等一系列举措,为大学贡献社会奠定校脉基础。随着时代的更替,大学逐步将自身的职责拓展成为有利于全体人类的繁荣发展,使得知识掌握与运用成为每个人的共同权利。2017年,它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的17个指标分别纳入学校的整体发展中,使得普惠公众的学科知识能超越意识形

态、发展阶段、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融入大学教学科研、日常运营、公共参与和伙伴拓展等方面,成为具有普适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充实全球共同利益。2019-2020年,奥克兰大学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影响力排名中,居于全球首位。学校在SDG的17个考核指标中,有15项指标处于全球大学前列^[35]。由此可见,当大学将学校的现实追求设定为向本土或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时,它在教育行动中自觉呈现出最大可能的包容性、易享性和增值性。这些特性也构成大学耦合公益与收益的价值彰显,使得大学的实际输出能基于投资于人、援助于人、惠及于人来确保教育财政来源,同时为维护公共利益、群体生存、社会安全与发展循环提供“知识生产、能力建设、信息分享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使得大学教育成为一项跨越国别和族裔、促进人类幸福与繁荣的共同努力。

(二) 三类路向: 大学公益性与收益性耦合的审视维度

1. 制度路向

大学卓越发展的关键路向取决于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系统重构。作为制度灵魂的价值观念和作为制度存在与运行形式及其表达方式的制度载体,它们是大学公益与收益共生并进的法理基础与基本保障。价值观念制约着大学制度的宗旨、愿景和取向,而制度载体则能实体化为大学践行发展规划的路径、方式与手段。重构大学的灵魂旨趣与精神气韵,尤其需要在价值观念上重新认识大学公益性与收益性的耦合关系,在制度载体上平衡公益性与收益性的潜在冲突,最终在促进大学自主发展的进程中赋予其全新的治理角色与实践基点。奥克兰大学在创立之初就将培养教师和律师等社会公用人才作为大学服务公益的实践路向,并在此后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夯实大学的价值取向,使之制度化、组织化,成为导引大学行稳致远的制度准则。

2. 配置路向

大学公益与收益良性互动的动力之源在于大学如何配置校内外资源,在权衡中择取良方,在批判中谋求发展。如果大学在制度取向中传导并过滤着公益与收益之间的张力,而确保制度天平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或诱导因素而盲目滑向“学术资本主义”窘境的重要支撑因素就是大学如何来配置其学术自觉与营利活动。随着对收益渠道的关注、市场力量的重视,给予大学进行科研创新的公司资助以及私营企业在公益活动中的频繁出现,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能够调配来自不同相关利益者生产发展要素的自为机构。因此,大学只有明确其资源配置的道德要求与公共责任,才能有效促进公益与收益的双向调和,使得大学在公共价值的引领下不断扩大自身的收益面与辐射度,实现大学办学理念与社会公共需求在空间上紧密关联、在性质上相互交融。

首先,大学在校内资源尤其是财政投入的支持力度、保障范围和中立程度上应该对接适龄受教人口接受高等教育

机会和过程的公平性诉求,尤其是弱势群体在高等教育中的入学率和学业成就,确保大学教育形式和内涵公平。其次,大学在校内资源配置上需要基于大学收益有效反哺学校基础性和关键性活动的总体原则,在财政经费拨付与资金结构调整等方面构建支撑大学愿景实现的财政管理体系,力求达成人的全面发展。最后,大学应用“共同利益”来凸显共同行动的重要性。为追求教育本真价值,大学应积极协调校内外各方共同行动,超越公益与收益对立的界限,摒弃固有的教育供给模式,创造包容性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营利性机构等在教育供给中的优势,激发各类办学主体的活力;提升自身在教育治理工具选择、公共政策制定、动态监管等方面的治理能力^[36],凸显学术教育成就。

3. 增值路向

大学公益性与收益性产生良性互动的一个重要判别依据就是收益的溢出效应是否能真正推动人力资本的持续优化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适用转化。当公益系统和收益系统交互部分发生耦合,逐步构成一个新的整体系统,使原来的系统发生进化,形成一个全新的大学发展体系。二者的正向交互必须促使各自体系在保持各自特征的同时,提升各自的能级,产生超越叠加效应的增值效能。

首先,良性互动的耦合体系,可以促使大学公益性与收益性的各子系统能够直接参与相互作用并促进彼此正向发展,由此自发地形成一个新的有序结构体系。以奥克兰大学为例,学校从满足人和社会融合发展的普适愿景出发,一方面在调适相关利益者所需与所获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学校公益性在学术自觉、知识生产、成果分享方面的触角,使得教育输出的回流效应在实现“共同利益”中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该校始终从社会收益、文化收益、财政收益等多元视角来审视学校战略行为的有效性和达成度,始终坚持产出导向的行为模式,最终实现单独系统所不具备的增值效应。其次,学校始终专注于公益性与收益性在耦合过程中保持各自的体系特征,而学校也始终以卓越发展、服务人类社会为要旨,来把控二者在提升学校核心能级方面的脉动方向。它从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两个主要层面来构建大学内部系统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的渠道,不断提高各类资源配置的支撑公益与收益耦合的效度,促进大学内部循环的沟通顺畅。最后,作为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大学必须以自身独有的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三大领域的发展问题。当前的教育体系总是试图教育人类认识并改造世界,这在无形之中将人与周围的环境割裂开来,引发生态危机。因此,大学公益性与收益性的耦合指向应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价值回应,关注人类社会如何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围绕生态意识重塑人类地位。为此,大学的自觉行为是着眼于反思人类自身的生态性,公益与收益所产生的价值增长应源自教育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围绕人类世界的未来生存去重构教育的内部系统。

(三) 适度超前: 大学公益性与收益性耦合的理想趋势

高等教育效益的滞后性与人才培养的周期性要求高等教育在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相对超前性、独立性与稳定性。只有当大学公益性与收益性既保持相对独立又在各自需求的交汇点上有效互动时,其所产生的交互效能才能促进大学教育输出与区域经济发展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由于高等教育效益需要“适度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在新经济背景下,大学教育系统提供创新的教育方式,在培养未来社会劳动力及世界公民上应发挥超前作用。大学公益性与收益性在耦合中必须适度超前于社会现状,以更为宏大与超脱的视野来关注自身的良性发展。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提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涵盖2030年要实现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实现性别平等和推动创新等目标,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设计框架等。教育的包容与公平意味着让所有人都可以实现随时随处学习,无论种族、年龄、性别、背景等,都可以平等地拥有受教育的机会。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进一步暴露出世界各地教育系统的脆弱性与滞后性。因此,教育系统只有适度超前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模式,才能体现出教育的耐受性和坚韧性。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衡量大学建设成效的高等学府,奥克兰大学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经公布后,就将增加高质量大学教育与服务、通过经济和物质援助消除各类人群入学障碍、强调教育过程对于学生的学习意义以及加强家庭与社区在学生在学习中的影响等纳入大学自治的行动范畴。这令学校的整个内部运作体系始终是贴合世界教育的前沿走向,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界定自身的教育教学服务,促使传统的学校教育变得更为开放,与外界建立起更为多元良好的协作关系。随之而来的是该校对教育质量的界定与指标也发生着历史性变革,其内部公益与收益的耦合也以一种超越传统大学线性发展模式的现实存在,推动大学朝着更为包容、更为持久的卓越教育体系加速迈进。

该校所推崇的世界主义原则(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界限的共同人性,带有普世性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思想基石^[37]。当通过普世价值的理性系统进入学校的内部体系,世界主义就与个人、社会、民族和国家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彰显出个人的能动性,与国家公共利益、社会价值观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主义价值观有机叠加。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学公益性与收益性耦合的理想趋势是致力于“人的解放”和“社会改造”,努力培养出具有批判能力的世界公民,为全纳社会提供前沿的智力与技术支撑。奥克兰大学以人力资本优化与科学技术进步来凸显大学对人与社会持续成长的耦合价值,在串联人与社会协同发展中体现大学的耦合效能,以超越社会当前发展需求的前瞻方式引领学校的卓越发展。

四、结语

奥克兰大学是世界知名学府,在新西兰具有重要意义和特殊地位,在国际高等教育界也有一席之地。该校的发展模式为我们理性审辨新西兰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切入视角。奥克兰大学依托高度自觉发展的大学系统,通过系统耦合的方式为大学内部各子系统的有机链接提供了动力机制与组织保障,导引着现代大学在社会经济承载力范围内不断转型升级,为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一体化构筑智能联动体系。

参考文献:

- [1]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University - Profile - 2019 - 2020 [EB/OL]. (2020 - 02 - 10) [2020 - 12 - 25]. <https://www.auckland.ac.nz/content/dam/uoa/auckland/about-us/the-university/official-publications/university-profile/University-Profile-2019-2020.pdf>.
- [2] 黄剑坚, 王保前. 我国系统耦合理论和耦合系统在生态系统中的研究进展[J]. 防护林科技, 2012(5): 57 - 61.
- [3] 周光礼. 国家工业化与现代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分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4(3): 55 - 61.
- [4] 张首魁, 党兴华, 李莉. 松散耦合系统: 技术创新网络组织结构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06(9): 122 - 129.
- [5] [9] [27] [29] 张欣亮, 苏庆伟, 郭博涵.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参与区域协同发展的特色与经验[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21(1): 80 - 92.
- [6] [美] 弗兰克·纽曼, 莱拉·科特瑞亚, 杰米·斯葛瑞. 高等教育的未来——浮言、现实与市场风险[M]. 李沁,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89.
- [7] [13] 黄彬. 大学公共性的困境与重建[J]. 高等教育研究, 2015(5): 1 - 7.
- [8] [36] 张国玲. 美国营利性大学营利性与公益性争议、协调机制及发展趋向[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9): 103 - 109.
- [10] 卓泽林, 赵中建. 外包: 美国公立大学私有化不可避免之抉择[J]. 外国教育研究, 2015(6): 54 - 65.
- [11] KIRP, D. L. Shakespeare, El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The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3.
- [12] 曹如军. 高校教师社会服务能力: 内涵与生成逻辑[J]. 江苏高教, 2013(2): 80 - 82.
- [14]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Key developments 1883 - 2000s [EB/OL]. (2000 - 02 - 11) [2020 - 12 - 25]. <https://www.auckland.ac.nz/en/about-us/about-the-university/the-university/university-history/key-developments-1883-2000s.html>.
- [15]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Vision 2030 and Strategic Plan 2025 [EB/OL]. (2020 - 11 - 02) [2020 - 12 - 25]. [https://www.auckland.ac.nz/content/dam/uoa/a-](https://www.auckland.ac.nz/content/dam/uoa/auckland/a-)

- bout - us/the - university/official - publications/strategic - plan/2021 - 2030/taumata - teitei - vision - 2030 - and - strategic - plan - 2025. pdf.
- [16]汪丁丁. 教育的问题[J]. 读书 2007(11):28.
- [17]石中英. 教育哲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01.
- [18]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Strategic Plan 2002 - 2004 [EB/OL]. (2002 - 04 - 08) [2020 - 12 - 25]. <https://www.auckland.ac.nz/content/dam/ua/auckland/about-us/the-university/official-publications/strategic-plan/strategic-plan-2002-2004.pdf>.
- [19]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Vision 2030 and Strategic Plan 2025 [EB/OL]. (2020 - 11 - 02) [2020 - 12 - 25]. <https://www.auckland.ac.nz/content/dam/ua/auckland/about-us/the-university/official-publications/strategic-plan/2021-2030/taumata-teitei-vision-2030-and-strategic-plan-2025.pdf>.
- [20]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05 - 2007 University Profile Part A [EB/OL]. (2004 - 07 - 27) [2020 - 12 - 25]. <https://www.auckland.ac.nz/content/dam/ua/auckland/about-us/the-university/official-publications/university-profile/profile-part-a-2005-2007.pdf>.
- [21]Theodore W. Schultz.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 [22]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1):3-42.
- [23][28]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nnual Report 2017 [EB/OL]. (2017 - 12 - 31) [2020 - 12 - 25]. [auckland/about-us/the-university/official-publications/annual-report/2017-annual-report-university-of-auckland.pdf](https://www.auckland.ac.nz/content/dam/ua/auckland/about-us/the-university/official-publications/annual-report/2017-annual-report-university-of-auckland.pdf).
- [24]白玲, 安立魁. 智慧教育: 中巴高校合作的战略选择与施为路向——基于巴基斯坦《高等教育2025愿景》[J]. 比较教育研究 2020(7):27-34.
- [25]朱鹏举. 新西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22.
- [26]马文婷, 阚阅. 公平入学与改善学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新教育战略的传承与转向[J]. 比较教育学报, 2021(1):55-66.
- [30][34]张民选. 疫情下的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世界危机与中国行动[J]. 比较教育研究 2021(2):3-15.
- [31]吴晓萍. 国际公共产品的软权力研究[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 13.
- [32]Kaul, Inge, etc.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Managing - Globaliz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ter one.
- [33]张建新. 国际公共产品理论: 地区一体化的新视角[J].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009(1):31-49.
- [35]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nswering The world's Call——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SDG Report 2020 [EB/OL]. (2021 - 02 - 10) [2021 - 02 - 26]. <https://www.auckland.ac.nz/content/dam/ua/auckland/about-us/the-university/sustainability-and-environment/sustainability-development-goals/SDG%20Report%202020.pdf>.
- [37]徐玲. 批判教育学的新主题: 世界主义及其理性的研究——以托马斯·波克维茨为例[J]. 比较教育研究, 2021(3):39-45.

The System Coupling of Public Welfare and Profits: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Excellent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University of Auckland

ZHANG Xin - lia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Public welfare and profitability are a pair of key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universities. The coupling of the two system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university to achieve excellent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world - class university ,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in New Zealand optimize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the key issues , and promotes the self - conscious development of its autonomy , academic freedom , diversified financing , and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Taking the public welfare of education as the core , the university constantly expands the coverage and conversion rate of university income , and constructs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pattern of system development and university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Auckland; system coupling; development practice